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邓开颂

葡萄牙人是从事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殖民主义者，澳门则是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市场和据点。澳门的苦力贸易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明嘉靖三十六年起至清道光三十四年（1557—1844）止，这长达二百八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苦力贸易不仅从这里开始，并一直是“以澳门为中心”来进行的。第二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45—1874），特别是从咸丰三年（1852）后，澳门的苦力贸易曾猖狂一时，可以说是“兴旺发达”时期。从光绪元年到辛亥革命（1875—1911）为第三时期，澳门的苦力贸易被迫停止，名义上结束，实际上澳葡当局仍仿照香港的办法，将“猪仔馆”改为“自由客栈”，打着“自由移民”的招牌，继续贩卖苦力，可以说是“稍形敛迹”时期。因此，我们研究澳门的苦力贸易，对于了解中国苦力贸易的起源和发展，揭露西方殖民国家掠夺中国苦力的本质以及苦力（华工）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远航东来贿赂广东地方官吏而租占我国澳门之后，就开展在澳门掠卖人口，进行苦力贸易活动。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二十一日刑科给事中郭尚宾上疏说：

“夷人佛郎机，以番船易达，故百计求澳而居之。……有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取货，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为焉。”^①

有鉴于此，明、清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规定：“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恫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②乾隆十四年（1749）又下令：“禁贩子女：凡在澳门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译定之例，分别究疑。”^③但是，葡、英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十八世纪末以后，随着开发美洲殖民地的需要，在澳门变本加厉地进行贩卖人口的活动。嘉庆十五年（1810）葡萄牙人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种茶，不久全部死亡^④。英国殖民者也在澳门拐骗华工，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和十九年（1814）二月先后两次从澳门贩卖一千七百名苦力，运到英属东印度新殖民文岛^⑤。这说明，在鸦片战争前，葡、英殖民者就在澳门进行大量贩卖苦力（人口）的活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初步沦为半殖民地，

禁止贩卖人口的禁令更是名实皆亡。于是澳门港的苦力(人口)贸易活动更加猖狂一时,葡、英殖民者公开设立“招工机构”来从事苦力贸易。据《1860年广州华商致英国领事馆文》称:

“迩来不意葡萄牙人于澳门开设招工馆数处,串通彼等所庇护之华商,……运用各种诡计,诱骗良家幼童,以及无知乡愚。一经拐骗或掳获,或称‘猪仔’,即被置于海泊,囚于黑暗舱中,然后运往澳门‘猪仔馆’,……被拐带者六七万之众,家毁者可六七万户,兴言及此,谁不为之痛心哉!”^④

以后“招工馆”与日俱增,拐卖人口的数目也不断增加。据估计,在1865年,澳门有8至10家招工馆(也叫“猪仔馆”),1866年增到85~40家^⑤,同治十二年(1873)发展到300多家,经营苦力贸易的商人达三、四万之多^⑥。这么一来,把过去的非法偷运变成了“合法招工”;被掠卖的苦力(人口)变成了“自愿移民”。而且,不仅贩卖成年男女,还贩卖幼年儿童。据《中西闻见录选编》“澳门近事”记载:

“澳门……上月有船载粤工出洋,共三百七十五名,续有尚未出洋二船,共载工人三百六十余名。闻每月更将幼童五六十名,潜匿各船出洋,每年不下五六百名。”^⑦

根据葡萄牙官方的公布,从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二年(1856~1873)十七年间从澳门港运往古巴、秘鲁的苦力(人口)就有十八万多人。详见下表:

1856~1873年从澳门运往古巴、秘鲁苦力人数表

年 代	总 数	去 哈 瓦 那	去 秘 鲁	去其他地方
咸丰六年(1856)	2,493	2,253	—	325
七年(1857)	7,383	6,753	450	—
八年(1858)	10,034	8,913	300	—
九年(1859)	8,969	7,695	321	—
十年(1860)	8,719	5,772	2,098	—
十一年(1861)	—	—	—	—
同治元年(1862)	2,536	752	1,459	—
二年(1863)	6,660	2,992	3,738	—
三年(1864)	10,712	4,469	6,243	—
四年(1865)	13,784	5,267	8,417	—
五年(1866)	24,343	15,767	7,681	—
六年(1867)	—	—	—	—
七年(1868)	12,206	8,835	3,371	—
八年(1869)	9,000	4,124	4,876	—
九年(1870)	13,407	1,064	14,343	—
十年(1871)	17,083	5,706	11,377	—
十一年(1872)	21,834	8045	13,809	—
十二年(1873)	13,016	6,307	6,709	—
合 计	182,504	94,715	83,192	325

资料来源:根据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55页表,略有增加。

据上表统计, 1856——1873年, 共从澳门出口华工182, 504人, 占同一时期出洋华工总数将近一半。

二

鸦片战争后, 特别是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的二十多年里, 澳门的劳力贸易曾猖獗一时, 形成高潮, 其重要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第一, 西方殖民国家急于开发它们的殖民地和占领地, 急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它们视华工为最理想的对象。

十九世纪上半期,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棉花、茶叶、蔗糖等热带经济作物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咸丰元年(1851)在北美洲西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洲南部的澳大利亚发现金矿, 引起掘金狂潮, 加上铁路的兴建, 农田的开垦, 森林的采伐以及秘鲁、古巴的自然资源开发, 还有马来西亚锡矿, 爪哇各岛香料、茶叶、蔗糖等种植园无不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 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 先后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 禁止贩卖黑奴, 饱受苦难的黑人和印第安人, 一旦获得自由, 纷纷跑入深山丛林, 拒绝再到庄园中去工作, 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和危机。各种植园主和矿业主急需大批劳动力进行补充, 它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泉源”^⑥, 视华工为最理想的对象, 于是, 西印度群岛中的英、法有势力集团, 向他们的政府提出向中国招工的要求, 接着在外交上常与美、英、法处于对立的西班牙, 葡萄牙和秘鲁等争先加入竞争行列, 还有荷兰、美国、夏威夷(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掠夺华工上也不甘示弱。

古巴和秘鲁的苦力主要来自澳门, 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 当时还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岛上的种蔗制糖工业需要中国的劳工。秘鲁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国家, 辽阔的国境只有二百多万人口, 从国外移民, 特别是中国契约工, 来解决本国劳动力的不足, 是秘鲁立国以来的国策。葡萄牙靠着它与拉丁美洲的历史关系, 又盘据澳门可以作为从中国大陆掠卖人口的据点, 便成为西班牙和秘鲁办理招工业务的代理人。

第二, 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 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 造成了人口向国内外转移的压力, 这成了澳门苦力出洋的来源。

鸦片战争前, 清王朝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对人民出洋一向是严加禁止的。三申五令, 不仅要严惩出国而回来的臣民, 而且臣民本身也不敢回归。一些回来的苦力说: “我们害怕中国官吏的检查, 他们手下员司的压迫和自家族人和邻舍的虐待。在我们回到中国时, 我们会被诬控为盗贼和海盗, 被诬控为夷人的暗探, 为奴隶的购买者和拐骗者。很多人长年的积蓄被盗窃了, 另一些人, 家里房屋被折毁, 而且禁止他重建新房; 更有些人被迫要偿还伪造的借据。我们孤立无援, 亲戚们视我们如路人。”^⑦

鸦片战争后, 门户洞开, 一切听从侵略者摆布,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华工出国的态

度，完全是不顾人民死活的，说什么“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⑩。并把私自出洋的华工说成“是敝国的坏人，死了不要紧”^⑪。而对侵略者的非法掳掠，则听之任之，还签署了一系列出卖人民的条约，使在华进行苦力贸易合法化。首先是广东的地方政府，不经北京同意。咸丰九年（1859）两广总督劳崇光和广东巡抚柏贵擅自与英国巴夏礼制订招工章程和契约，允许广州以及广东各海口设招工公所，公开招工，接着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承认英、法在华的招工权利。同治三年（1861）同西班牙签订“天津条约”准其在华招工。同年，清政府同英、法公使三方签署了外国（指有约国）在华招工章程条约二十二条。同治七年（1868）又与美国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这些条约中所谓“合法化招工”实际是掳掠合法化。

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解体，加速了阶级分化，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是“地狭人众，纵有大年，不足三月粮”的地区，常受粮荒的祸害，清政府虽从海外进口大量粮食，仍远不能解决人民饥饿，沿海人民“耕三渔七”，然而出海捕鱼，一遭台风袭击，则人船俱亡，至于天灾人祸，更使人束手无策，所以人民视外出谋生为重要出路。再加上时值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前后，在清政府疯狂镇压下，闽、粤劳动人民，大批大批地逃往香港、澳门出洋避祸。人口的大批转移，为澳门的苦力提供了来源。

第三，澳门经济全面衰落，从劳力贸易中寻求出路，高额利润的引诱，这是澳门苦力贸易形成高潮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作为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中转港，广州的外港，已从繁荣的顶点走向全面衰落，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英素所说：“尽管澳门在它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次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⑫

首先，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⑬，以后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广州地位的跌落，直接影响澳门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于咸丰初年另辟了澳门至北海港航线，用艏头船到北海运输来自“广西之北流，玉林、南宁、百色、归顺州。龙州及云南、贵州之货物”^⑭，并向这些地方输入棉花、洋药、洋铁等，企图挽回他们在澳门贸易的败局，但是“烟台条约”的签订，北海港也开放了，至此，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达三十四个之多，这样一来澳门再不是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了。其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占领香港后，他们利用香港的优良的天然条件，很快把香港发展成英国在远东倾销产品的商业基地，成为中国沿海各口岸以及东南亚和欧美各地转口贸易的中心，昔日在澳门的洋行商馆，纷纷迁到香港经营，澳门的出入口生意一落千丈，其进出口的商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花、棉布和棉纱，还有大量的鸦片走私贸易，出口商品除茶、丝之外，现在出现了大量的苦力贸易。再次，澳门港的自然条件不能再适应大汽船停泊和近代化贸易的需要，澳门内港水位淤浅，水深不到一米，西洋较大的货轮无法直接驶入码头，外港虽然水位较深，但经常受台风袭击，不利于外轮

停泊：而葡萄牙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既不能象香港英当局那样建造深水港码头，也不能深挖内港航道，澳门港对外交通范围大大缩小，与外洋直接往来日益困难，只好变做隔海相望的香港的附庸了。此外，葡萄牙本国经济的崩溃，使澳门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由于以上的四个原因，澳门以进出口贸易为主体的经济完全走向衰落，社会经济异常萧条。关税收入锐减，道光二十八年（1848）阿玛勒任澳门总督时，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后来，随着苦力贸易的兴旺，澳门的经济才有所转机。

“自和议成后，澳夷不能专利，渐至穷蹙，而是时秘鲁，古巴等国，买华人回国供利，日“猪仔”，在澳门设立招工馆，奸人籍以为利，诱骗华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⑧葡、美等殖民者通过澳门贩卖苦力，猎取了高额利润。据美国记者凯利报道：

“劳动力的需求如此之大，种植园的资本家都愿花500元的代价买下一名能使用八年的中国佬，这种贩运的利润很容易计算。我到苦力船上看过，送到市场上去的900名活人，对于苦力进口商来说，就等于45万元的财富，而他们原来花费的成本，总共还不到5万元，运往古巴便可得到40万元的盈利，即使在非洲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惊人的利润。”^⑨

近代爱国思想家郑观应，在他的《贩奴》一文中说：“粤东澳门……向有拐骗华人出洋之事……猪仔一名载至西洋，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务官收费二元。”^⑩

苦力贸易成了澳门财政的主要收入，据特瑞修神甫统计说：“澳门政府每年通过苦力贸易，约有二十万银元的财政收入。”^⑪这笔收入相当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葡澳海关税收总数的五倍。难怪乎，当1878年12月20日里斯本政府公布葡萄牙国王关于禁止澳门贩卖苦力的敕令时，澳门一片混乱：

“就如青天霹雳，所有在澳门之洋人、华人，无不满街飞跑，打听此事实，如有贼杀来，又如大火的光景。”“澳门地方葡、秘、西三国人所开招工局，计有三万余所，现俱关闭停业，管招工事务葡国委员及招工局各项人等，向来俱靠招华工发财，现在忽然无此生意，就如得重病一样，垂头丧气。”“澳门地方，一无正经生意，专靠招华工一样坏事做生意，现在将招工之事禁止，这三、四万人又靠何事活命度日。”^⑫

第四，咸丰二年（1852）厦门人民反抗拐骗华工后，澳门很快成为贩卖苦力出洋的最大港口，各国商人多在澳门设立据点。

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直接贩卖苦力，是从厦门开始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厦门被掠卖的华工就有180多人，而到咸丰二年（1852）仅八个月的时间被掠卖的人高达1789人，殖民主义者在厦门掠骗华工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厦门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如咸丰二年（1852年11月21日）厦门人民捕获了一个为英商合记洋行进行拐骗华工的拐子手，把它送交参将衙门处理。但当天该洋行经理桑穆强令释放了这个拐子手，由于清朝地方官吏的腐败无能，激起普遍士兵和人民的联合反抗。尔后，厦门人民相继罢市，集合示威，美国军舰“萨拉门特”竟开枪惨杀八名中国百姓，重伤十六人，血腥的屠杀激起厦门人民的愤怒，此后，厦门每天几乎都发生制裁人贩子的事件，同时对厦门洋行的贸

易也一致予以抵制。这样，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厦门拐到一个华工了，经营苦力贸易的外国投机商“几乎不能继续在厦门做生意”^②。因此，苦力贸易的中心就南移到广东，澳门也很快成为贩卖苦力出洋的最大港口，这门生意导致澳门商业的迅速发展，到了同治五年（1866），已有大批的专在贩卖苦力生意中投机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据广州美国领事馆译员梅辉立估计，1865年间澳门的猪仔馆不过8~10家，而1866年竟增加到85~40家。1865年间苦力的牌价是每一个人头85元至40元，第二年则激增每一个人头60元至80元^③，过了六、七年，猪仔馆猛增加至300多家，以“卖猪仔”为业的由原来800人，剧增至三、四万人。苦力贸易是澳门最大宗的生意。

“澳门地方和它的居民都依靠贩卖这种人身货物所得利润而极度繁荣。”^④

三

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出国华工艰辛劳动，创造财富，对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第一，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开发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和促进其经济发展上面。十六、十七世纪初期，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国家进入了封建社会，有的处于奴隶社会，还有少数国家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经济很落后。从澳门运送出去的千百万苦力华工，散布在东南亚各国，明代后期已达十万人以上。这些苦力华工有的从事矿山的开发；有的在种植园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有的垦种田地，生产稻谷，把无数的荒山野岭变为富源，用他们奴隶般的劳动把原来一些不毛之地变为经济发展的地区。这种经济上的影响与作用，连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威也十分肯定，他说：“开发马来西亚的锡矿，首推华工，由于他们的努力，致使马来亚能供应全世界用锡量的一半，是他们的才能和劳力，才造成今日的马来亚；……英人初经营马来亚时，着手于道路建筑和其公共工程，皆成于华工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工开辟道路，投身蛮荒，冒万死，清除森林，开辟道路，每有牺牲性命的。此外做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很多。英国政府修铁路筑桥梁，全由华工包办。当时欧人不敢冒险投资的，华工则冒险为之。又经营商业，开半岛之航路，招致华工，开半岛未启之富源；英属马来亚政府十分之九的收入，皆出于华工之手。凡一事既成，应知其之所以成功，读此文者，均知华工有造于马来亚各国也。”^⑤

所以，马来亚的殖民官泼赛尔（Purcell）也承认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没有现代的马来亚，而且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就永远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⑥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劳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也充分肯定中国华工对该地开发的重要作用：“若无中国移民（华工），我们将一事无成。”^⑦

十六世纪末，西班牙博士（Dr Antonis Morga）亦进一步肯定华工对菲律宾城镇经济建设的作用，云：

“凡一镇的建成，是不能缺中国人的。他们是各种事业的经营，而且工作十分艰苦，工资很低^{②8}。约翰·弗曼（John Foreman）对于华工在东南亚诸国及菲律宾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是肯定的，他指出：

“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是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番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糖榨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他们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用大铁锅熬糖的制糖法介绍到这个殖民地。^{②9}

到了近代，这种苦力华工在工厂、种植园等生产中更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马尼拉和甲来地（Cavite）有九家机械厂、造船厂和修船厂，雇用了3,782名华工，但后来因排华法案实行以后，华工工人数大大减少，使工厂迅速陷于衰退^{③0}。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的劳动力为10万人，其中华工占45,700人^{③1}，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可见，华工对开垦和发展橡胶种植园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明清以来，马来亚早期华露兰缕的开创，锡矿和橡胶事业的发展，印尼爪哇的胡椒园，勿里洞和帮加锡矿的开采，波罗门洲和苏门答腊烟叶园的开辟等均与华工奴隶般劳动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千百万华工的艰苦劳动，就没有近代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对美洲国家经济的影响

在美洲各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华工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从澳门运去苦力最多的秘鲁，根据温贝托·罗德里格斯著《秘鲁的苦力华工》一书记述，1849~1874年约有十万名华工被贩运到秘鲁，占当时秘鲁人口的1.8%，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秘鲁沿海各地种植园和沿海岛屿鸟粪开采场劳动，大大促进了秘鲁两大经济支柱——农业和鸟粪开采业的发展。至于秘鲁修筑山铁路主要是依靠华工的力量，有些工段，华工竟占了全部筑路工人的一半。因此，该书作者最后说：“亚洲人（指华工）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具有决定性意义。”^{③2}又例如美国，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西半部地区仍是一个人迹稀少的荒僻地方。可是当三十万苦力华工被贩运到美国后，就逐步被开发起来了。1877年美国官方承认：由于华工的廉价劳动力，使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获得更加迅速的开发和发展。增进了太平洋（美国西部）的物质繁荣^{③3}。加州的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是靠苦力华工，华工占加州矿工总数的一半以上^{③4}。据统计，1849~1856年，美国加州11个矿区所产黄金总值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华工开发创造的。而加州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也是依靠华工，计华工占农业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五。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莱丹也说：“加里福尼亚加迅速发展，没有中国劳工是不可能的。”^{③5}这说明，美国的开发，华工是付出了巨大劳动的。又如旧金山，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附近有五百多英亩的荒凉低洼地，经过华工的平整种植，变成肥沃的良田。地价由每亩0.5—3美元提高到每亩20—100美元，增长了40—50倍^{③6}。年产小麦四十万吨^{③7}。所以郑观应说：“美国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逐成富庶之邦”^{③8}。华工对开发美国的贡献还特别表现在兴修美国第一条太平洋铁路上。华工是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主要劳动力。据美国国会调查，这条铁路全部工程的五分之四是由华工承担的，人数达四、五万

之多^⑨。有一万名华工经常在工地上劳动,最多达到一万四千多人。这些华工负担着最沉重的劳动,如开方经甯路基、辅轨架桥、打通隧道。当时内华达山区遇上连续两年的特大风暴。大雪崩和大塌方常发生,上万名华工惨遭不幸。可见中央太平洋铁路是由华工的血汗修筑而成的。而这条铁路对于沟通美国东部和太平洋沿岸之间的联系,对于开发美国西部地区和发展美国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1877年2月2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指出:“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由于华工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就物质繁荣而言,毫无疑问,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资本家因为有了华工而大获其利。这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入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岸)的物质繁荣。”^⑩

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财富是离不开对华工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的,是无数华工的血汗和生命凝聚而成的。

第三,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贩卖人”原是主要来源之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家,在澳门经营苦力贸易,把华工运到东南各国和美洲各国去出售,从中获得惊人的巨额利润。这样巨额的利润带回西方各国转变为货币资本,必然成为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雄厚资金。使之成功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近代世界历史的先进国家。所以说: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暴利基础上的。诚如马克思指出:新兴的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有1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他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⑪

本文责任编辑 林炳熙

注 释

- ① 李长付:《中国殖民史》第207页,1936年版。
《郭给疏凉稿》卷1,第11页(丛书集成本)。
- ②③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
- ④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
- ⑤ Moe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 1635—1834” Vol 3 Chap 69。
- ⑥ 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资料》第1册,第470~47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 ⑦ P. C. Campbell:“Chinese Colic Emigration” p. 152。
- ⑧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 ⑨ 《中西闻见录选编》第26页,《澳门近事》。
- ⑩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3~4页。
- ⑪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篇第11页。
- ⑫ 《外交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0期,《旅居南洋华商宝商约大臣公禀》。
- ⑬ 《荷属华侨废约运动》1927年,上海,第3页。
- ⑭ 英索:《澳门—远东最古老的欧洲殖民地》第25页。
- ⑮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 ⑯ 梁鸿勋:《北海杂录》“原始”。
- ⑰ 陈澧:《香山县志》卷八,《海防》。
- ⑱ 转引自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197页。
- ⑲ 《郑观应集》上册第413页。
- ⑳ 特瑞修:《历史上的澳门》。

罗克汀教授的现象学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重视

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国际上和历史上且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罗克汀教授多年来对现象学的渊源、实质、理论结构、发展趋势等现象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重要研究成果。近年来他除了在《哲学理论》等杂志发表了多篇论文以外，1986年又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论集》（论文集）。他的两本现象学研究专著《现象学理论体系剖析》及《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的演变》，亦已脱稿，交出版社印行，即将出版。

罗教授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目和好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代行全国哲学社会规划领导小组职能）在社科（86）研字第23号文件中，特别专门邀请他担任《现象学研究》这个重点科研项目的课题主持人。

罗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国外亦引起了同行的注目，对他的研究成果撰文评介。美国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术组织国际现象学会，以学会主席的名义写信给罗教授要求他同该学会联系。此外，该学会主办的刊物《现象学探究》在1986年第10期又发表了海外学者金坚先生撰写的专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在中国的研究与展望》。在论文中，金坚

先生介绍评论罗教授近年来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五篇。金坚先生用了较多篇幅，对罗教授的五篇论文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是因为他认为：“中山大学教授罗克汀近年来专门研究胡塞尔思想，对此作了较多的介绍和批判。”虽然金坚先生不赞成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现象学进行研究和评论，但他也认为，包括罗教授在内的中国学者对现象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中国学者“为此所做的工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金坚先生特别注意到罗教授对于胡塞尔现象学与萨特存在主义之间的纵向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罗克汀教授“对胡塞尔思想的人道主义性质和胡塞尔与萨特之间的本体论上的继承关系作了一些分析尝试。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研究的范围和进程比他的同行先走了一步”。因为“目前中国对胡塞尔与现象学运动中其他思想家之间的关系研究较为鲜见”，所以，金坚先生对“罗克汀教授在题为《从胡塞尔到萨特现象学本体论的演变》一文中在这个领域内的探讨”，特别表示赞许。

从上述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罗教授的研究成果是相当重视的，正如一位美国著名的现象学者所说的：中山大学是一个国际上研究现象学的重要单位。

· 学思 ·

① 总署清档。

②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第213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梅辉光报告，1866年11月12日。

④ 美国议会文件，第16号《罗伯逊致哈孟德文》。

⑤ Swettenham：《英属马来亚》第231~233页，译文可参考李长付：《南海华侨史》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⑥ Vietor pureell，〈Malaya〉P128，译文参考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历史研究》1980年1期。

⑦ 参看李长付：《南洋华侨史》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⑧ Marga，〈Philippines〉，（〈菲律宾〉）P394，译文参看李长付：《南洋华侨史》第70

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⑨⑩⑪ 转引自陈翰笙先生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44页、50页。

⑫⑬⑭ 转引自张锐：《秘鲁的苦力华工》，《世界历史》第一期。

⑮⑯⑰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⑱ 王造时译《美国外交政策史》第366页。

⑲ 《盛世危言》第59页“贩奴”。

⑳ 朱杰勤：《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㉑ 转引自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㉒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